

勞
幹
著

魏
晉
日
南
北
朝
史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22

26

勞
幹
著

魏
晉
南
北
朝
史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新一版

魏晉南北朝史

定價：
精裝每本新台幣一三〇元整
平裝每本新台幣八〇元整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作者：勞 幹
出版者：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11-16號
發行者：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于正路一號
電話：八六一〇九二三
郵撥：一〇一四二五號帳戶

門市部：華岡書城
地址：臺北市農安街三十五號之一
電話：五九四八四五

印刷者：華岡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大功館
電話：八六一一八六二

魏晉南北朝史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羣雄爭霸、世局混亂的朝代，由於連年兵荒馬亂及政局迅速更迭轉變，使得它的歷史混亂不明。本書原是作者於課堂上講授之筆記，鑑於客觀的需要及國內魏晉南北朝史的缺乏，遂整理成冊，以適應社會大眾的需要。全書共分九章，自東漢的淪亡說起，直到三國之興亡，西晉時代、東晉時代、北魏之成立與分裂，南朝之興亡，並兼論南北朝經濟、兵制、文學與學術等問題，是國內研究此時期最精確的專書。

魏晉南北朝史 目次

第一章 緒論……………一

甲、東漢與南朝……………一

乙、東漢的士風與曹魏……………五

丙、東漢以來的宗教與經濟……………一二

第二章 三國之興亡……………一八

甲、東漢的分裂……………一八

乙、魏國的篡漢與司馬氏的得勢……………二一

丙、蜀漢的北伐及孫吳的開展……………二五

第三章 西晉時代……………三〇

甲、西晉的政局……………三〇

乙、八王之亂……………三三

第四章 東晉時代……………三七

甲、五胡之亂……………三七

乙、東晉的立國……………四七

第五章 北魏之成立與分裂……………五六

甲、北魏初期……………五六

乙、孝文遷都以後時期……………六三

丙、北齊與北周……………六九

第六章 南朝之興亡……………七二

甲、南朝的政治變遷……………七二

乙、南朝與門閥……………八三

子、世族的政治地位……………八三

丑、世族的社會地位……………八七

寅、世族在政治上的把持與衰退……………九〇

第七章 南北朝的經濟問題……………九六

甲、田制問題……………九六

乙、貨幣問題……………一〇四

丙、商業與交通……………一一二

第八章 南北朝之兵制……………一一六

第九章 南北朝的文學與學術……………一二六

甲、文字與文學 一二六

乙、音韻之研究 一二八

丙、歷史學 一三一

丁、科學 一三三

附 錄 一三七

一、世系表 一三七

二、大事年表 一四二

魏晉南北朝史

第一章 緒論

甲、東漢與南朝

中國的全部領土，在很遠的古代，都是曾經有人住過的。至少我們不能證明全中國中的某一區域，在古代未曾有人到過。但是中國的華夏文化，卻應當以黃河流域爲一個重要的據點。

從殷虛的大龜和大量的海貝看來，當時黃河下游和南部的海岸既然有物資的交流，當然也有文化的傳播，到了西周以後，南方的開發更有顯著的痕跡。再經過了立國南方的楚，再經過了西漢和東漢，南北的關係，越來越深，到了三國以後，長江流域更成爲中國文化的重要堡壘了。

凡是一個文化高的民族，比較文化低的民族，更易於滋生傳播。華夏民族文化高，自然也就滋生快，人口密度大，因此不論東西南北，任一方向，都是華夏民族擴張的目的地。

然而中國的西北邊境，是一個世界性的大草原，永遠在不平衡、不安靜的局面下過日子。東南邊境

，卻是易於扼守的丘陵地帶，並且又不處於民族遷徙激流的對衝之點。所以西北邊境總是建設了又破壞，而東南邊境則是建設一步即增進一步；因此東南邊境的文化遺產一天一天的豐富，最後便超過了黃河流域的「中原」了。

西北邊境的動亂已經成爲西北開發程度落後的主要原因，再加上西北雨量的不足，農作物不能給養大量的人口，使得西北文化，更爲落後。

天時和人事已經使西北邊境趕不上東南，再加上東漢初年及東漢晚年兩次內部變亂，使得西北一帶，更爲荒廢。在這個時候，漢族雖然自相殘害，但塞內和塞外的胡人（匈奴、東胡等蠻族），是有組織的，他們並未受到太嚴重的影響，因此胡人分布的地盤，便乘機增加起來。到了晉代初年，所謂「五胡」已佈滿了三輔、太原、上黨、河東、北地、西河及新興郡（河套區域）諸地。原來這些蠻族和漢人雜居之時，因爲他們一般文化程度較低，往往被漢族輕視，到中原不安靜之時，蠻族便起而據地稱雄，組織政權了。

北方的情形既然是這樣的，我們再看一看南方。南方的原野，本來應當只是森林和沼澤，但是在周初已經有漢南諸姬的開發，經過了楚國的開發，再經過了吳國的開發，使得長江流域，變成了繁盛之區。但漢代初年，巫峽以下，够上一萬戶以上的都市，還只有長沙、南昌和吳縣（註二）。並且許多地方，還是利用原始的耕種方法，「火耕水耨」。再經過了西漢一朝，到了東漢時代，許多循吏勵精圖治的成績，南方的經營，便漸漸的有了頭緒了。最顯著的證據，是拿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比較一下，便

可顯然的看出來，西漢西北諸郡人口比東漢密，東漢東南各郡人口比西漢密。到了東漢晚期，劉表的招納流亡，使得荊州繁榮起來，後來曹操攻擊荊州，這一部分財富又到了三吳。

三國的變亂，已經使中原人士紛紛逃向江南，再加上了一個東晉南渡，更成了中國中古文化在南方開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西晉的開國，在司馬氏皇家說來，是一個政治性陰謀的成功，但就這件事的社會意義來說，卻是東漢的世家豪族，對當時壓迫者曹家政權的一個總攻擊。但世族的地位雖然重行增加，東漢遺留下世族中高尙而廉潔的風氣仍被破壞無餘。所以司馬氏時復興的世族，其內容和其意義並不等於東漢的世族，而是另外的一種政治形態。這種執政的世族，使得中央的政治及地方的政治同時腐敗下去，最後世族自相爭奪，在諸王領導之下起了內戰，以致人民的困苦增加了，國家的實力消耗了，士氣和人心瓦解了。邊疆以外的蠻族侵入中原，終於在中原建立了蠻族的政權。

當着這個時候，中原逃難的人民，像洪流一樣的逃到淮泗流域，更轉而逃到江南，還有的是從淮泗一帶轉入荆梁，這些流徙的人口，使得不僅江南和太湖區域得到更深的開發，並且閩粵等區域也在這個時期開始繁榮起來。

人口的流亡影響到相關的土地問題和經濟問題。在北方因爲人口流亡，過去已經墾闢的土地變成荒廢。政府方面因爲站在財政的觀點，開始對土地加以經營，形成了屯田制度，而皇室占田、均田制度等，也在這個情況中發生。同時因爲人口流移，戶口平均都減少了，南北兩方因爲爭取稅源，又引起了大規模的兩方政府掠奪對方人口的舉動。

在人口流移時候，從淮泗而下，集中到荊州和揚州，因此這兩股流移的人口，便成了兩種政治勢力的基本。東晉以後，許多政治上的競爭，大都脫離不了荆揚兩州的地域性的爭持。此外，流移的人建立政權之後，有了武力及經濟上的勢力，壓倒了原有的住民（其實也只是些更早的移民），因此就發生了「僑」「舊」的問題。因為「僑姓」（註二）往往成爲特殊的階級，他們要保持原有的籍貫，不肯歸入南方戶籍，以便享受特權，因此「僑郡」、「土斷」的問題，也就隨著發生了。

南朝的政治，集中在荆揚二州，因之荆揚二州的若干都市繁榮了，隨著這些都市而發生了的貴族莊園，也都漸次的擴張起來。這許多莊園兼併了附近的土地，隨即發生了「封山占澤」的現象。其在北方，因爲蠻族國家掠奪的人口，尤其是軍人和技工，往往集中於首都，因之商業及水利也集中於首都，並且因爲宗教信仰的發展，北朝的寺院經濟也特別的發達，而首都的寺院就更爲加多，更爲壯麗，自然影響於首都繁榮的進展也就更爲迅速。

這些隨着區域的不同而發生的地方性差別，都是便於割據地方勢力的，尤其各地有各地特殊的賦稅制度及貨幣制度，使得割據的形式，更爲普遍。因此，若干的州郡及莊園成爲自給自足的原始狀態。

幾個大都市，因爲附近的區域較爲廣大而趨向繁榮，沿海以及西北區域，因爲得到國際貿易，也得到了繁榮。但長期封建狀態之下，卻使許多偏僻的地方，因孤立而荒廢，以致中央和地方，起了若干不必要的隔閡。尤其是北魏末期的六鎮與洛陽，生活狀況、物質享受完全不同，變成了北魏覆亡的重要因素。在南朝因封建領主和皇朝之間利益始終不能一致，不論在那一個段落之中，都未曾集中有效的力

量，也就注定了南朝限制在長江流域，而無法統一中原，光復華夏。最後統一的還是繼承北朝的隋文帝。

乙、東漢的士風與曹魏

西漢一朝學術的演進，儒學已成學術的中心。本來社會道德已經固定了，再加上政治的長期安定，選舉的方式，也固定在鄉舉里選的法則之下。名譽好的士人，才能得著進身的階梯，他們在本鄉可以「仕州郡」，在全國可以選為秀才孝廉，在漢書中的「內行修」就是一個重要的論人的標準。

從西漢經過王莽再到東漢，雖然有治有亂，但大致說來，將近四百載的時期中，並無安心作惡的壞君主（桓靈還祇是受人蒙蔽的庸主，尚不至於安心作惡），也沒有壞的不堪的外戚，甚至於梁冀雖為罪惡所歸，也還能重視人才。這一種安定風氣的養成，使得兩漢政治上軌道，使得士風的修飾成為兩漢時代的一個重要現象。

這種修飾的士風，約制的儒行，當然也會成為知人論世的準則。其中誠然有許多虛偽的人藉着名譽來釣取利祿，但其中也不是沒有具有真心信仰而身體力行的人。例如後漢書第二十九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所記的便全是以孝行著稱的人。

其中的例子如汝南郡的薛苞，被後母憎惡將他分出。他每日號泣，結廬家外，每朝仍入家灑掃，又被父逐出，仍在里門外作廬，不廢朝夕謁見的禮貌。一年以後，父母後悔，仍然還家，後來仍為父母共

服六年喪服，哀感動人。再與弟分家，選擇壞的房屋和田地。弟不善經營，數次破產，他仍再將產業分給與弟。章帝時皇帝特徵召，位至侍中。

又後漢書韋彪傳稱：「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這些孝子，我們可以說，一方面是賦性篤厚，一方面也由於孝友成爲一般的道德標準，世人便在不知不覺之中，更培養這種感情，因此也就比其他時期，更爲顯著了。

再如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稱：「太原荀恁，少修清節，資財千萬（千萬卽千萬錢，當黃金千斤），父越卒，悉散與九族。」又王丹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嫻者恥不致，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浮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得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治，風俗以篤。」在這方面所表現的，一方面是有些人願意替鄉里做不取代價的服務，另一方面在鄉里之中，隱然成爲一種勢力。

這種鄉里中的勢力，當然有其光明的一面，也必有其黑暗的一面。所以就有人不願和鄉里中的親友發生關係。例如後漢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坡田，常勤肆自給……鄉黨宗族，希得見者。」朱暉傳：「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朱暉之子卽絕交論著者的朱穆。在這裏邊，又可見東漢時期鄉誼過度的發展，也自然有其流弊。

這種鄉誼是從鄉和社發展而成的。社的發展很早，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在漢代大致一里爲一社

，再經許多社的結合而爲鄉，由政府聘請鄉三老來聯繫。到了光武建武三年，再命郡國行鄉飲酒禮，那就更和儒術接近了。鄉飲酒禮，據周禮爲每三年正月舉行一次，漢代承秦法，以十月爲歲首，武帝太初改歷，許多制度未改，所以鄉飲酒禮仍在十月舉行。（註三）其後汝南月旦評（見鄧攄傳）也是在十月中舉行，可見月旦評和鄉飲酒禮，是有若干關係的。

這種鄉里的聯繫再加上東漢門生故吏和府主宗師的聯繫，到了桓靈之際，越受外面的壓迫，團結便越加堅固，而桓靈之際，又是宦官當政，名士矢志的時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和當政的皇權，更顯著對立了。

這時一般的士人，家世並不完全一致，財產也貧富不等，但立場是相同的，他們都希望有一個清明而公平的中央政府，他們才能有出路。並且也顯然的，社會中的中間階級，或中產分子，是同情於他們的主張。

這一種社會運動發展的結果，不僅要對於君主、貴胄、宦官抗衡，並且對於中間社會階層，也因為政府中官吏位置不夠，競爭劇烈而互相排擠。當然不免有成羣結派的習慣，這也就是東漢的「三五法」的根據，來預防中央官吏和地方發生關係，失去監察的效用。而東漢時代宦官攻擊儒生，稱爲「黨人」，也不見得全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

後漢的黨人誠然有不少的弊端，甚至還有許多不盡情理的事。但這般人中卻也有不少的人，具有過人的操守，發自真誠，決非出於虛偽。但是鄉黨及士人的團結對政治卻可以發生別的影響：第一、中流

社會形成了一個集團，不便統馭。第二、彼此結黨相攻，在政治上不易看出眞的是非，更增加了行政方面的困難。第三、社會上過於看重了道德的因素，忽略了能力的培養，因而行政幹部有時難以尋覓富有活力的人才。——因此到了獻帝時期，曹操當政，便轉換了一個另外的方向。

曹操的政治，很顯明的有法家的傾向，他對於東漢禮教的風氣很不贊同，他直接開展了法家的風氣，間接開展了清談的風氣，關於這件事的前因，我們可以做一個分析：

一、曹操本人不是出於禮教的世族，他是一個宦官子弟，他的先天潛意識對於東漢儒生習慣不會贊同。

二、他的本人雖然不完全具有壞的成分，他有時也未嘗沒有正義感，不過他的出發點，是法家的，他的道德觀念也是法家的，和西漢的酷吏中，如郅都、尹賞等人的出發點都差不多。

三、曹操的少年生活本不同於禮教世家，三國志本傳說他「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注引曹瞞傳：「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這都是漢代遊俠少年的風習。到了曹丕之時，也受到了不少的影響，例如曹丕典論自敘：「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曹眞）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直到明帝時這種遺風尚有存在的，魏志高柔傳：「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於滎陽左右，同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此種好遊獵廣禁苑的傾向，還可溯源於曹操的時期。這又是和東漢儒雅的儒生是不同的。

曹操本人既然和儒生是在另外一個立場上，因此他也就在建安時期，利用他當政的地位，發了著名的魏武三令。

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時也，若必待廉士而後用，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唯才是舉，吾得用之。」

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有司明此意，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棄矣。」

二十二年令：「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卒成王業。吳起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不敢東鄉，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高才異質，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明說要求的是明白治術的人才，縱然不忠不孝也沒有關係，明白顯示著曹操用人是不願受東漢以來一般習慣的拘束。這種用人方法的動機，當然由於東漢以來儒生的道德和能力脫節，越被社會敬仰的人，越是沒有能力的人，為著事業的成功，是不能不將能力格外看重而不再顧及道德一項條件。這樣標準之下，曹操確曾收羅了不少的人才。

但曹操雖然得到了一部分成功，卻在當時也明白顯示出來不小的弊端。三國志杜恕傳，杜恕說：

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所致慎也。這樣下去，使得魏代很少有忠心衛國之士，最後動搖了魏代的國本。